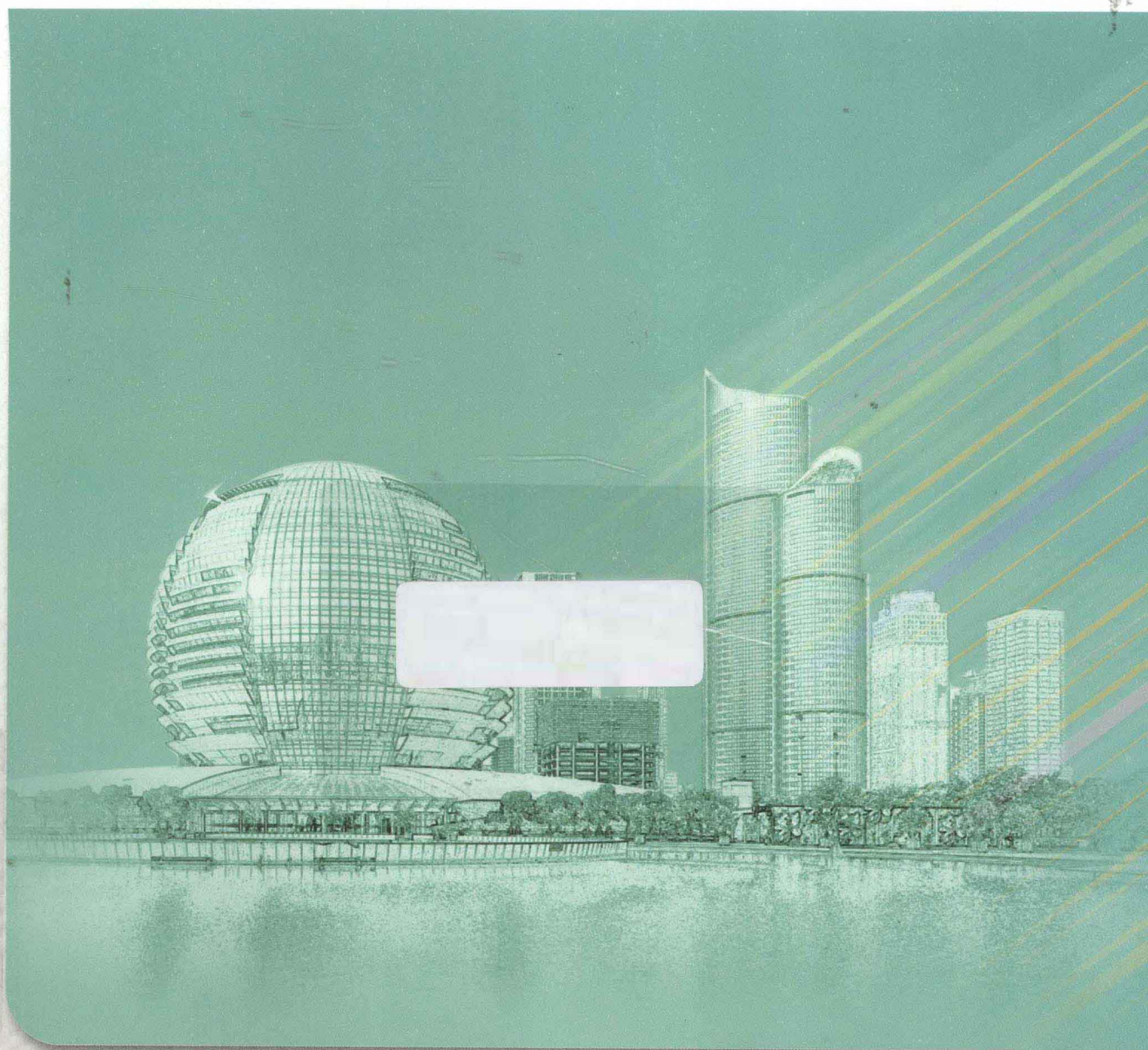


第 6 辑

城市学研究

URBANOLOGICAL STUDIES

城市学研究编委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6辑

城市学研究

URBANOLOGICAL STUDIES

城市学研究编委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学研究. 第6辑/《城市学研究》编委会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61-2768-1

I. ①城... II. ①城... III. ①城市学—研究
IV. ①C912.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799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门小微
责任校对 马智慧 苏祥荣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中浦长三角论坛·杭州 2012

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单霁翔/1
关于城市化的十个问题	王国平/6
关于推进长三角地区城市转型与创新的思考	范恒山/20
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路径选择:转型与创新	
——“中浦长三角论坛·杭州 2012”专家观点综述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24

后世博时代长三角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探寻“城市病”的破题之法 推进长三角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陈 跃/37
中国发展 3.0 和城市绿色转型	
——基于 PSR 方法的研究	诸大建/41
建设上海为研发枢纽城市	王 铮/47
城区产业结构升级与发展转型	金兴明/51
新型城市化与区域转型发展	史晋川/55
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与长三角转型发展	何立胜/58
推动长三角全面转型 走绿色发展道路	魏后凯/64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长三角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朱瑞博/68

长三角地区城市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我国创新型、服务型城市的评价体系及建设路径	李程骅 郑琼洁/84
-----------------------------	------------

长三角四省市竞合性人力资本政策实证研究 陈洪安 李乐 关奉民 杨秀林/98

城市化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考与探索

——基于对全国 306 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问卷调研的分析 李德 李怡/109

城镇化:长三角农村现代化的路径考量 毛燕武/121

试论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合理价值取向

——兼论“迁徙自由”概念的适用定义 房波 欧阳君君/127

长三角地区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研究

柏拉图与中国儒家思想对城市规划的启发 梁鹤年/132

需要结构的转变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影响 马拥军/135

建设特色文化城市与后世博时代城市可持续发展 蓝蔚青 王天舒/143

文化是长三角创新转型的基础 蒯大申/151

社会复合主体与文化认同

——基于城市文化视角的分析 陈立旭/156

长三角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建设与发展 杨国华/167

长三角文化贸易一体化发展研究 张海涛/173

信息资讯

“中浦长三角论坛·杭州 2012”成功举行 182

“中浦长三角论坛·杭州 2012”获奖论文 185

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单霁翔

文化部党组成员

故宫博物院院长

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顾问

城市文化是建设和谐城市的重要基础，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内容，是城市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影响并决定着城市发展的前景和方向。从传统的功能城市到今天的文化城市，文化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元素。

一、我国城市文化建设应当避免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却重视不足。归纳起来涉及八方面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加强城市文化建设，避免城市文化危机加剧的紧迫性。

一是避免城市记忆的消失。城市记忆是在历史中慢慢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但是，一些城市在所谓“旧城改造”中，由于急功近利作祟、经济利益驱使等人为因素，实施过度的商业化运作，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文物保护单位被拆迁和破坏的事件也屡见不鲜。由于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二是避免城市面貌的趋同。城市面貌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凝结，是城市外在形象与精神内质的有机统一，是由一个城市的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一个城市的文化发育越成熟，历史积淀越深厚，城市的个性就越强，品位就越高，特色就越鲜明。但是，一些城市在建设发展中，城市面貌正在急速走向趋同。由于城市规划建设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面貌雷同的城市街区占据越来越显著的位置。各地具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城市风貌正在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几乎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

三是避免城市建设的失调。城市建设是为了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也包括文化环境。而城市规划则是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保护人文与自然环境,维护社会公平,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它的根本目的不仅是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的功能城市,更在于建设一个社会和谐的文化城市。但是,一些城市在建设缺少科学态度和人文意识,往往采取单一依赖土地经营和房地产开发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导致出现“圈地运动”和“造城运动”,严重损害了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而这些项目却往往突出功能主题而忘掉文化责任。

四是避免城市形象的低俗。城市形象是城市物质水平、文化品质和市民素质的综合体现。它表现出每个城市过去的丰富历程,也体现城市未来的追求和发展方向。美好的城市形象不仅可以实现人们对城市特色景观的追求和丰富形象的体验,而且可以唤起市民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但是,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作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建筑体量追求高容积率而破坏了原有的城市尺度和轮廓线,寄希望于城市在短时间内能拥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筑,以迅速改变城市形象。而大量新建筑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城市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

五是避免城市环境的恶化。城市环境是城市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城市环境与城市的生态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高度敏感性。好的城市环境不但可以保证人们身体健康,而且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研究城市环境的基点是如何使人与城市更好相融,城市如何既宜人居住,又宜人发展。但是,一些城市以对自然无限制的掠夺和征服来满足自身发展的欲望,致使环境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城市改造中的大拆大建也造成巨大的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错位、超载开发更使不少文化遗产地及其背景环境出现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趋势。

六是避免城市精神的衰落。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内核,是提升城市文化积淀的结果。城市精神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并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城市精神的概括和提炼,可以使更多民众理解、接受城市的追求,并转化为城市民众的文化自觉。但是,一些城市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目前不少城市纷纷提出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存在盲目攀比、不切实际的倾向。一些城市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标志性建筑”的数量,表现出对文化传统认知的肤浅、对城市精神理解的错位和对城市发展前途的迷茫。

七是避免城市管理的错位。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其实质是人作用于城市发展的过程,应肩负起对未来城市的责任。通过城市管理,不但要提供一个工作方便、生活舒适、环境优美、安全稳定的物质环境,安静和谐、活泼快乐、礼让互助、精神高尚的文化环境同样重要。这就需要文化意识指导城市管理。但是,一些城市在管理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在管理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管理效应上重近期轻长远。由于不能从更高层次上寻求城市管理的治本之策,导致往往等到城市问题积重难返之际,才开始采取各种应急与补救措施,可惜

为时已晚。“城市病”所产生的系列病状及后遗症，病根在于城市管理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缺乏应有的文化视野。

八是避免城市文化的沉沦。城市文化是市民生存状况、精神面貌以及城市景观的总体形态，并与市民的社会心态、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城市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缓慢演变发展，形成城市文脉。城市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的未来。但是，一些城市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不是深化自身的人文历史，而是浅薄化自己的文化内涵，使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行为方式，弥漫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中，消解人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在文化领域，一些人的价值观扭曲、错位，拜金、享乐主义蔓延，“文化危机”问题以及伴随而来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深层原因，是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立场的危机。

二、在城市发展中进行文化再造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功能城市”的《雅典宪章》。该宪章以功能分区的观念规划城市，并指出城市的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要协调、平衡发展。功能城市的理念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人们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功能分区无法解决复杂的城市系统中的诸多问题。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价值，具有越来越突出的决定性作用，而文化遗产则是城市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最宝贵的资源、财富。

1. 城市文化与和谐城市

城市文化是社会文明在城市的缩影，是社会和谐在城市的集中表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既是治国谋略，更是城市文化的精髓，是实现社会和谐、诚信、责任、尊重、公正和关怀的保证。将这一文化精髓贯彻到城市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去，才能创造和谐城市，实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市民是城市的真正主人，既是城市文化的受益者、传承者，也是城市文化的体现者、创造者。市民素质影响并决定着城市素质。因此，创造和谐城市，首先取决于城市市民的文化素养。这种素养一方面来源于当地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受到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是，能够使广大市民所熟悉、理解和接受，并凝聚、提炼成为城市精神和文化特色的，只能是以前者为主体，充分吸收现代文明的积极因素。否则，城市文化和精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自身的根基和特色。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之说，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在许多城市的文化遗产中都有着直接的反映。通过保护和发掘城市文化遗产中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继承和弘扬和谐共处的传统文化思想精髓，提升市民

的总体文化素质,形成和谐积极的城市文化氛围,是建设和谐城市的重要基础。

适宜居住是和谐城市的重要特征,也是“以人为本”在城市建设管理中最直观的反映和要求。将城市目标定位为适宜居住,体现了城市建设和发展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不仅关注城市的物质生产、经济积累以及城市各方面的建设在数量上的增长,更关注文化的发展,关心人的发展成长,重视和发挥人的作用。这就对城市的管理者和决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适宜居住就是要以市民的全面发展和身心愉悦为中心进行规划建设,而不是片面地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仅要有舒适的居住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富有活力的工作氛围、完备的基础设施、完善的社会保障、安全的社会治安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城市文化的继承和培育。通过保护城市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人文环境,尤其是城市文化遗产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表现形式、环境景观、空间范围,提高市民对城市的亲切感、满意度,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精神享受和情感慰藉。因此,“宜居”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感受、一种和谐和一种文明。

2. 文化竞争力决定城市竞争力

城市是人类文化的最高体现和重要结晶。一个城市的发展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实力。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概念,既包括经济竞争力,也包括文化竞争力。城市文化的力量正取代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而日益占据城市经济发展的主流。在物质增长方式趋同、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的今天,城市文化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体现出较强的经济社会价值。这也是城市文化得到各国城市政府关注和重视的主要原因。

文化竞争力可分为文化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文化硬实力包括一个城市的文化设施健全程度,文化遗产数量,文化从业人员的结构等。文化软实力则包括一个城市的文化氛围、文化传统、文化法规健全程度和城市居民的规则意识等。与提升文化硬实力相比,提升文化软实力任务更为艰巨。

文化软实力能够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价值观,因而日益受到关注。当今经济活动依靠的是文化内核,科研创新依靠的是文化造诣,生产管理依靠的是文化修养,技术掌握依靠的是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依靠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与经济日益相互交融,文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传统文化是增强一个城市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是激励一个城市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城市鲜明的文化个性是城市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城市文化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之所在。因此,保护城市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发掘和彰显城市的文化特色和个性,成为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城市文化品牌是城市文化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城市文化品牌是城市的内在素质和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是城市的整体风貌和特色,是城市文化价值的体现,它可以起到升华城市形象、凝聚城市精神的作用。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形成城市文化品牌的重要源泉。一个城市的文化品牌要享誉全国,走向世界,先决条件是对那些能够体现城市特色的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挖掘、集聚、整合和利用。特色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稳定的知识产权。因此,城市文化品牌的确立,一定要维护

好历史传承,留住城市的“命脉”,在保护中弘扬,并取得市民的认同和参与,使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再现时代人文之光。

3. 城市文化创新引领城市发展方向

当前中国城市不仅面临对旧有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的问题,更面临对新的城市文化创造乏力的问题。丧失了保留至今的文化遗产,城市将失去自己的文化记忆;创造不出新的城市文化,城市将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城市文化首先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有的文化积淀;城市文化也要展现现实,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城市文化内涵;城市文化还必须昭示未来,顺应城市的文脉,发展、创造属于自己城市独特的新文化。

文化遗产包含了更多随着时代迁移与变革而被人们忽视或忘却的文化记忆,只有唤起这些记忆,才能真正懂得人类文化整体的内涵与意义。文化的延续发展需要一个民族的根,文化创新的高度往往取决于对文化遗产发掘的深度。同时,城市的发展,不仅要有对文化遗产的传承,还要有对新的城市文化的开拓和创造,应该有创新的能力,能够不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的文化,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活力。

城市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城市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城市发展才有持续的力量。所以,城市文化不仅需要积淀,还需要振兴、创新。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当前,不断创造新的城市文化,是满足城市居民精神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面对城市居民迫切呼唤新的城市文化生活,也要求城市必须提高自己对新的城市文化的创造能力。保护与发展必须统一起来,而且可以统一起来,保护传统文化本身就是现代化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而言,不论未来城市的结构与形态如何变化,在城市文化的组成中,必然既有本土文化,又有外来文化;既有现代文化,又有传统文化。城市就是这样一个多种文化的共存体。城市文化保护与城市对外开放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古今中外的城市,凡是能够吸引人的,都凸现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上,而不是与世隔绝。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主要是城市文明。而城市发展的重心是文化,文化也是城市发展的最终价值。城市化进程不应仅仅是一个量的指标,更应该是一个质的飞跃。现代城市要在发展中进行长期和持久的文化再造,并在再造中创造新文化。

关于城市化的十个问题

王国平

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
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客座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兼职博士生导师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主任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我们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李克强副总理也指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展望未来，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他在去年11月会见世界银行行长时指出，“未来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在于城镇化。”认为“13亿人的现代化和近10亿人的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贡献。”我们认为，城市兴则天下兴，城市稳则天下稳，城市安则天下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发展史。21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后，中国城市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城市化已成为人类进步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和核心动力。

一、何谓党的工作“重心”和“重点”？

城市是党的工作重心。早在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主席在会议第一天所作的报告中说：“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转折点。”60多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作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城市化率也从1949年的7.3%，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1年的51.3%，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我国建制市总量已从1949年的132

个，上升到2010年657个。为了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今年中央已决定召开一次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足见中央新领导班子对城市工作的高度重视。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是党的工作重点。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13亿人口，曾经农村人口占到9亿。目前，仍有一半的人口在农村，就是像杭州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也有32.8%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却是一个弱质产业；农村是我国最大的区域，却是一个弱化区域；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群体，却是一个弱势群体。因此，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1994年以来，每年要召开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和部署“三农”工作，连续多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扶持“三农”工作。可见我们党对“三农”工作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大会议，明确提出了“新四化”和“四化同步”的概念，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要坚持把城市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走城乡互促共进的城市化道路。”因此，我们认为城市发展离不开“三农”问题的解决，“三农”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城市的发展。只有坚持工作重心与工作重点的结合，坚持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才能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我们认为，城市与“三农”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党的工作重心与党的工作重点的关系。因此，无论是由“锤头”和“镰刀”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还是由“齿轮”与“谷穗”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既象征着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联盟，也象征着城市工作重心与农村工作重点的结合。

二、何谓“城市”？

“城市”一词，在西方最早出现于拉丁语（civitas）中，意思是公民组成的社会。在汉语中，城市是由“城”与“市”两个字组合而成的。“城”指的是围绕着人口集聚区建造的房屋工事，比如“城墙”、“城堡”，“市”指的是进行商业活动的集市，把“城”和“市”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防御功能和商贸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城市”，也就是说城市就是城墙加集市。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对“城市”的解释是：“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目前，世界多国都是以人口集聚的数量作为确定城市的主要依据，这也非常便于对城市的界定，如联合国就把居住人口在两万以上的地区统称为城市。在我国最权威的《城市规划法》第三条中有这样的解释：“本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城市规划法》上对城市的界定，已经包括了镇，所以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城市化率，它的基础是城镇人口，也把镇人口统计在内。我引用上述界定，就是想说明我们不要在“城镇化”和“城市化”上，在“城镇”和“城市”两个概念上再引起一番新的争论。我认为“城市”包含了“城镇”，城市化就等于城镇化。

在中国,无论从字面上进行解释,还是从规划法上进行界定,“镇”都已经包含在“城”里面了,所以我们提的“城市化”,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的“城镇化”,这是一对“同义词”。

数千年的城市发展史证明: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文化进步的载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新农村建设的引领者,也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阶梯。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在城市居住是为了生活得更好。”2000多年后的今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已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

三、何谓“城市化”?

我认为,不能把“城市化”等同为“土地城市化”,城市化是与城市相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城市化必须进行多维度的定义。所谓“城市化”,从人口学角度看,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民变市民、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从地理学角度看,就是城市向周边地区扩散、农村变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张、新兴城镇不断涌现的过程;从社会学角度看,就是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区传播,城市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取代农村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生产方式取代农村生产方式的过程。可见,城市化不仅是一个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国民意识转变的过程。

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城市化,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已经为西方发达国家200年甚至300年的发展历史所证明。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性因素。”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具有标志性的一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今后20年,中国城市化率仍有可能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每年将有1400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至203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有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70%。也就是说,中国只花了5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年才走完的路。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的研究成果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超过30%即进入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中期阶段,超过70%则进入城市化水平增长趋缓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这就是学术界公认的“诺瑟姆曲线”。

我认为,中国城市化要成为21世纪人类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就必须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强度投入、高效能管理;必须坚持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再进一步提出“一化带三化”,就是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杭州在新世纪初就曾提出“一化带四化”,即“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但是当前,城市化或者说城镇化明显落后于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06年浙江省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城市发展与增长方式转变结合起来,走经济高效的城市化道路。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是先进生产力的集聚地和各类创新要素的密集地,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自主创新的主战场。”

要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城市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起抓,以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现在,中国已进入只有转变发展方式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杭州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来说,如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我认为,首先要从城市抓起,首先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要以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和保障。只有把两个发展方式转变一起抓,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如果把两个发展方式转变割裂开来,必然是事倍功半。

过去10年,杭州为什么能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我认为关键就在于我们找准了比较优势、打造了竞争优势、构筑了发展优势,进而走出一条避免城市间同质化竞争、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具有杭州特色的发展之路。杭州的发展之路,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四、何谓“城市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钱学森先生提出了城市学这一重大课题,当然这个课题在国内不是钱学森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是正是由于钱学森先生的影响以及钱学森先生所建立的方法才使城市学有了重大突破。钱学森先生认为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要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科学系统地对城市进行研究。我们完全赞同钱学森先生的判断。钱学森先生是杭州人,我们感到很自豪,我们成立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举办一年一度城市学高层论坛,特别是把“城市学研究优秀成果征集评选活动”的最高奖项,命名为“钱学森城市学金奖”,这都与钱学森是杭州人有一定关系,更与钱学森倡导城市学有紧密关系。

在对钱学森城市学思想研读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城市学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城市产生、运行和发展的综合性学科,也是一门统领城市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新型学科。城市学各分支学科很多,比如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文化学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学既是“城市系统学”,又是“城市生命学”。之所以说它是“城市系统学”,是因为城市是一个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巨系统”,是自然、城、人形成的共生共荣的“综合体”。因此,城市学研究必须着眼于城市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来全面把握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各领域及其相互联系。之所以说它是“城市生命学”,是因为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有起源、有发展、有演变、有兴衰,也有人文精神、有性格特征、有文化意蕴、有个性魅力,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有着自己的生命信息和“遗传密码”。正因为生命不同、精神不同、个性不同、文化不同,才创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城市。通过城市

学研究,我们可以感受城市生命存在,分辨城市生命容颜,把握城市生命脉搏,识别城市性格差异,倾听城市情感诉求,捕捉城市精神意象,进而发现、把握、应用城市生命信息和“遗传密码”。我们说城市学是城市科学的核心学科,但它不是城市科学本身。城市科学是研究城市的学科群体,而城市学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它包含在城市科学群之内,是一个牵头学科。据统计,城市科学群有30多个独立学科,既有自然科学学科,如城市建筑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园林学、城市设计学、城市生态学,也有社会科学学科,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人口学等等。当然,城市学是一个牵头学科、核心学科,并不意味着城市学是某些城市专业学科内容的叠加或混合,更不是大杂烩式的城市研究成果拼盘,而是城市的系统学、城市生命学。

我们认为,要高质量地推进城市化,就必须坚持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研究“五管齐下”,而城市研究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的前提、先导和基础。在去年杭州召开的第二届城市学高层论坛上,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名誉院长徐匡迪说:“要破解中国‘城市病’需要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经营好城市,这是每一个城市管理者都要面对的问题,作为一个曾经的特大型城市的管理者,我认为更为关键的是要从发展战略高度研究好城市,只有研究好城市才能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经营好城市。如果我们在理论战略上思路不清晰,那么在实践中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就会事倍功半。”他还指出:“可以说中国城市学已经在杭州破题,这对于高速推进中国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件大事。杭州城市学研究也会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里程碑。”

中国城市学研究才刚刚开始起步,我们应该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从事城市学研究。如果中国再不对城市进行系统而又综合的研究,如果城市学的研究成果再不为中国数百万城市管理者所掌握,那么中国的城市化就会变成一场新的灾难。因此,要使城市化真正成为中国最大的内需之所在、最大的发展潜力之所在,就必须迅速地、大规模地、高水平地开展城市学研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以最小的成本、最低的风险、最大的成效,顺利地完-成城市化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五、何谓“寓城市发展于解决‘城市病’之中”?

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城市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发展动力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诸多问题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是自然的历史进程,如果顺势而为、妥善引导,会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得不好,也会带来诸多矛盾和问题,患上‘城市病’,影响现代化进程。”

预计我国将有可能用5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城市化之路。这就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相对短的时间里集中表现出来。要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难度的确很大。当前,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如何避免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发生“共振”,从而导致系统性城市运行风险爆发,是城市管理者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可以说,城市化搞得好了不得,搞不好不得了。如果在挑战面前败下阵来,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拉美现象”、“拉美陷阱”就是这方面的反面教材。

所谓“城市病”，实质就是中国城市化中最突出、党委政府最为关注，广大群众呼声最高的“城市民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日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说到：“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民“十个更”的期盼，实际上都与解决目前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上学难”、“就业难”、“社保难”、“就医难”、“住房难”、“环境保护难”等“城市病”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解决“城市病”问题；解决目前城市中最突出的“城市病”，就是解决广大群众的“民生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目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城市化”存在某种偏见或误解。认为“城市病”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只看到城市化的不良后果，不看到城市化给我国经济社会、给广大群众带来的实惠。误以为城市化是目前城市人口膨胀、土地短缺、大气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的“罪魁祸首”，把城市化“妖魔化”，盲目地反对城市化。人们不禁要问，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在城市居住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两千年后的今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已成为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工作期间，2007年在会见杭州党政代表团时，对杭州提出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指出“杭州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与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完全合榫。因此，世博会主题的演绎完全可以把杭州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许多好的理念和做法吸收进来”；“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提高老百姓经济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环境生活品质‘五大生活品质’，提得很好，说明你们抓民生抓到了点子上。对杭州提高老百姓‘五大生活品质’的各项工作，我印象深刻，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也是比较赞赏、肯定和支持的。”

我们认为，要推进城市化，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享受到美好的城市生活，就必须正视并破解“城市病”。只有破解“城市病”，才能真正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必须寓城市发展于“城市病”治理之中，城市发展、城市治理是手段，创造美好生活才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正在围绕当前城市化进程中最突出的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教育问题、城市医疗卫生问题、城市住房问题、城市土地问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城市环境问题等八大“城市病”进行研究，因为这八大“城市病”在当前各大城市都普遍存在，并有蔓延之势，这八大“城市病”也是广大市民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最关注、最关心的八大问题，广大市民迫切希望城市管理者能够研究解决好这八大“城市病”，从而使他们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六、何谓“四农一村”？

今天中国发达城市的“三农”问题，不但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且表现为日显突出的农民工和“城中村”问题。因此，杭州把农民工问题列入到“三农”问题范畴之中，并始终把解决“四农一村”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直强调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和“城中村”问题。

1. 解决21世纪中国“三农”问题的奋斗目标是“减少农民”。解决21世纪中国“三农”问题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应该是、也只能是减少农民，就是要把80%的农民转移出去，让一名合格的农民经营相当于过去5倍的土地，也就是说要让尽可能少的合格农民，经营尽可能多的优质土地。

2. “减少农民”是催生农民工、“城中村”，进而使21世纪中国“三农”问题演变成“四农一村”问题的根本原因。早在10年前，杭州就提出要解决“四农一村”问题，要把农民工问题和“城中村”问题一并纳入到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大框架下来思考。目前，中国“三农”问题已演变成了“四农一村”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再加上农民工、“城中村”。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问题和“城中村”问题都与减少农民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减少农民绝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农民的一种自发行为。实际上，中国农民“隐性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可以说，农民外出务工是中国农民为解决自身“隐性失业”问题，而闯出的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血路”。“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不是政府引导出来的，而是中国农民自己闯出来的，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不是一件天大的坏事。“城中村”之所以成为社会矛盾的集聚地，是因为农民工过多集聚造成的，他们的数量往往是本地农民的数倍甚至十几倍。由于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的缺失，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不同程度上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被边缘化的问题；由于农民工是农非农、亦工亦农，大多居住生活在“城中村”，城乡差距、市民与农民、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差距，也都集中反映在“城中村”中，如果“城中村”不改造，很有可能演变成西方的“贫民窟”，陷入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对城市建设管理特别是社会稳定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3. “四农一村”问题已融入中国城市化洪流中，成为中国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作为城市管理者，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四农一村”问题，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今天中国农民工的数量有2亿多，20年后可能达到5亿多。可以说“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据统计数据，城市人口中真正增长的部分不是本地居民的自然增长，而是外来农民工的快速增长。比如，杭州本地居民的自然增长率也只有3‰左右，上海本地居民的自然增长率已是负数。过去10年，中国城市化率提升了10个百分点，靠的就是农民工进城。今后20年，中国城市化率还可能再提升20个百分点，靠的也是农民工进城。换句话说，今天的“四农一村”问题，已融入中国城市化洪流中，成为中国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我认为，目前中国必须破解的最大课题是城市化问题，而新时期中国“四农一村”问题，特别是农民工问题是其中的重中